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 DIE GESELLSCHAFT DER INDIVIDUEN

## 个体的社会

[德国] 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翟三江 陆兴华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 DIE GESELLSCHAFT DER INDIVIDUEN

## 个体的社会

[德国]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翟三江 陆兴华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个体的社会/(德)埃利亚斯(Elias,N.)著;翟三江,陆兴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9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书名原文:Die Gesellschaft der Individuen

ISBN 978-7-5447-0549-3

I. 个… II. ①埃… ②翟… ③陆… III. 个人社会学—研究 IV. 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6116号

---

Copyright © 1987 by Norbert Elias.

Copyright © 1990 by Norbert Elias, edited by Michael Schröter.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Liepman AG,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1998-147号

---

书 名 个体的社会

著 者 [德国]诺伯特·埃利亚斯

译 者 翟三江 陆兴华

责任编辑 刘金源 李瑞华

装帧设计 武迪 姜嵩 顾晓军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 × 1304 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98千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549-3

定 价 24.00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 主编序

这里收入的译著，大多来自“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出版计划，其中有的已经问世多年，有的则还没有来得及印行，现在都被统筹到了新的系列中。

于是又要为此写一篇新序。也好！趁着这个时机，我就来交代一下这套丛书的初始动机。已经事过差不多二十年，所以不妨更加坦诚地披露：自己对于这类著作的心灵饥渴，当年是在街头的人流中突然涌现的。仿佛遭遇了大地震一样，我冷不防近乎绝望地发现，周边再没有什么可以遮风挡雨的，而头脑中更是空空如也——以往读过的那些迂远的智慧书，如今信着全无是处！

这样一来，就势必要从头读起，否则就无力去因应深重的当代危机。正是在这种发奋的心境中，这套丛书既延展了八十年代，又突破了八十年代。无论要为此陷入多少繁琐的细节，我念兹在兹的都一直在于：对于中国问题的解答，甚至对于中国问题的确认，都不能仅凭勇敢与冲动，还同样需要沉潜与周密。

为了咬定这个目标，我主动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如今看来也尤其适合我的道路。尽管身陷于官气十足的高等学府，不可能完全自外于

其名利规则,但更其吸引我的却是:由于更需要倚重读者的自由选择,所以中国的出版企业,就总是要超前于它的教育事业。说到底,正是学术出版的民间品格,才是自己长期热衷此道的真实原因。

就这样,在长达十余年的坚持与苦熬中,心血一点一滴地淌下,终于汇成了如今这一汪活水。幸赖译林同仁的通力合作,这套书居然积成了现在的规模。不过,眼下还不到庆功的时候,反而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其实在编辑过程中,慰悦与追悔、惊喜与惊诧,至少是同样的多。无论在确定书目、购买版权方面,还是在申报选题、甄选译者方面,总会蹦出意想不到的困扰,让原有的设想不断地打折和受挫……

幸而,这些点点滴滴的心血,经年累月地流淌下来,还是在顽石上留下了刻痕。正如我的另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早从坊间走进了北大的讲堂,开拓出了新的博士方向一样,我们这套主攻社会思想的丛书,也已开始成为北大同学的热门读本。在最好的情况下,总还是有可能不仅充当饭桌上的谈资,还会潜移默化他们的文化前理解。

正是在这个关口,我个人的兴奋点,就再次转回了研究室。毫无疑问,翻译工作对于现当代中国,具有别提多大的重要性。可话说回来,就算所有的翻译计划都得以实施,甚至所有的文句都没有翻错,中华民族也不能光靠这一点,就奢言什么文化上的崛起。若无力透纸背的批注,若无激烈抗辩的对话,若无充满想象的发挥,那么,这些历尽艰辛翻译出来的著作,终不过是些抛到水面的瓦片,刚刚溅起表浅的涟漪,就要沉入冰冷的一潭死水了。

要知道,我们这项卷帙浩繁的翻译工程,以及其他性质类似、规模较小的翻译工程,之所以能时时引起心灵的骚动,那无非是因为,当代中国的种种危机,有着无可回避的世界性背景——缘此,那些令我们深感困扰的中国问题,说穿了原本就是世界性的难题。

在这种情势下,也就理应心存这样的念想:一方面,如果自身并无

内在的智慧和思力，那也就没有什么资质和根底，去真正分享别人的智慧，而只会被这些天书把心智搅得更乱；另一方面，一旦真正读懂了这些译著，则注定要发愿去激活这类智慧，并把自己的创造性运思，毫无愧色地回馈给整个世界。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长年合作者彭刚，感谢他为此承受的繁难，和为此贡献的耐力——尽管若非遇到这种场合，以我们之间的默契与认同，原不必把这种感激之情说出来，更不要说当着公众的面把它说出来！

刘 东

2008年3月29日于京北弘庐



##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四五十年间就同一个主题写了三次，业务繁忙的读者挑1987年写成的第三篇（本书第三编）来读似也无妨。这第三篇谈到人类走向更高的认同形式是一种必然，个人、部落、民族国家、欧洲一体化这样的递进的认同形式，以及联合国这样的洲际联合，是人类并无事先计划和意愿，但照其本性倾向最终半推半就、迂回奔向的目标。这看上去相当高蹈的结论却会给今天很多谈论全球化的学者摆出难题：我们到底是在走向人类组织形式的全球本地化、中国特色、民族文化本真化，将差异当做抵抗之策略呢，还是在走向“后民族集聚”、世界公民协同性、世界社会？它尤其使我们两个中国读者对这样一些老问题重又辗转反侧起来：

一、中国之于西方的落后及其现代化真如埃利亚斯所说，是一个相对的时间交叉问题：与落后国家比，就是与自己的过去比，与先进社会比，就是憧憬自己的未来？要真正现代化，就必须触及现时社会的各种禁忌，触及每一个单个人的全部社会地位、个性结构，以及个人之间的全部的相互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个民族是真正“现

代化的”，每个民族总是正处于文明的进程里，民族间并不进行着向同一个目标的分立但并行的争逐赛，而是越来越融合的集聚和交汇，所以“发达国家其实也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它们在很多方面领先？大国或伟大文化在走向人类更大认同中会更困难，就在于它们会更难放下自尊心，追随别的民族走向更大的认同，会被其看做沦为二等帝国——英帝国过去一百年里体会到的破落和中华帝国近几百年里体会到的破落，其性质是一样的？“文明的”欧洲在过去，哪怕在今天，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走向哪里，中国此刻无法参照西方的框架来决定到底应往哪儿走，当然也就并不一定需要重复欧洲走过的路，因为这是此时的眼光无法预见，连精英知识分子都无法预言的？

二、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以及走向更高的认同时的全球化眼光中的我们的国民性（按埃利亚斯的说法就是个人的“社会习性”或民族国家的“社会习惯”）：新型的民族国家早已形成，国民意识却跟不上？抑或，因为国民意识跟不上，中国一直未能形成新型的现代化国家形式？到现在为止的列宁式的企图将几种发展速度不同的社会过程并在一起快速完成的做法，才使我们发现：社会改变了，而国民性未变？在全球化，或埃利亚斯所说的人类越来越认同于更大的共同体结构并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国民性或民族情性或民族个性结构，也正随着我们的民族的机运和经历的改变、积累而变化 and 成长，因为一个民族的各种机运会在几个世纪里积淀到其每一个成员的个性结构里，没有两个时代会有相同的国民性的？鲁迅、柏杨所说的“国民性”——其实他们说的也是两种不同的国民性——早就不同于我们现在身上的国民性了？人们从家庭、部落、民族国家走向各种世界共同体时，其个性结构也同时作出了相应改变？根本就不可能有生物学、人种学上固定的国民性（《德国人》，第 219 页）？对国民性的好坏判断，是一种对于“进步”的迷信：国民性落后总指的是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身上还

残留着以前时代留在我们身上的社会习性和个性结构特征？国民性之落后最终总是指社会成员个性结构的改变速度跟不上人类群体向更大的认同单位整合的速度？一百多年来我们对于自己的国民性成为现代化的障碍的忧虑，在埃利亚斯看来是否只是像一个小青年要离开自己的村落，到远方大城市谋生时，为自己的不经世事而生的焦虑和恐惧？从大处说，国民性总只是一个民族像看待另一个民族那样看待自己时所得出的图像，是民族集体关于别的民族是怎样来看待我们的、我们在他们眼里是怎样的这一点的设想？我们想弄清楚，也希望读者们弄清楚这个问题。

三、让我们听了很难办的一个观点是，埃利亚斯总是说，人类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总是并无事先计划地默默走向了更大的认同。他说，人类身上带有像染色体一样的一些促成人类不断作出更大认同的“生物调节因素”、“人类生理上的社会决定因素”、“一切人共有的人性中的那些常量”（《论时间》，英文版，第142页；另见《死之孤独》，第1节）；“生物上固有的结群共处的特性和迄今为止所形成的这种人类生活形式将决定我们必然走向全球化，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生活结构是最符合我们人类的本性的”。我们真可以推断人类各民族共享着同一种导向更大共同体的生物调节因素，人类大同是共同基因决定？他又说，我们无法知道应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于人类中更“文明”的群体，不知道要走向哪种更大的“生存单位”，每一个民族手里都只有像语言这样的象征手段——它使人类能“学习”——来体认、综合自己的认同处境，启蒙、解放之类的话语也都是一些像知识分子那样的当代巫师们对未来的参拓和例解，并不是最终方案？这可是一个连康德都不敢去实证的问题（参见《论一句老话：这在理论上虽是正确，在实践中却是无用的》中反驳门德尔松的那一章），难道埃利亚斯说得太轻松了？

四、埃利亚斯说,一个民族从一种认同结构迈向更高的认同结构,其成员的个性结构相对于新认同形式的滞后,需三代人(三十四年?还是一百五十年?)的努力才能赶上,我们忍不住要推导:等到社会成员的个性结构跟上了社会的改变,这时的社会是否又已发生了质的改变,这种滞后于是就成了社会中的常态?人类看来会你等我等他等地一直等到大伙儿都有一个很接近的认同,才会有一个达到很高交互性的共同体,这中间不知又会发生多少可怕的变故和反复?埃利亚斯又说,像联合国这样的不尽如人意的国际组织最终被人类情感所接受,固定为人类的共同认同机构,需要两百年左右的时间,可我们却担心,人类最无私的眼光也不一定比这看得更远,我们如何去要求未来的政治家和民众在处理当下政治问题时耐心保持黄仁宇所说的这种“长距离眼光”?

五、本书还使我们认识到了普遍人权对国民性的认识和改造的根本作用,其对于民族现代化的升华作用:落后的国民性由专制的国家和政府形式造成,因为它们可控制信息,政府决策可轻易获得合法性?(康德在《永久和平论》里反复论证:不能指望民众的道德来产生出好的体制,而应期望好的体制使民众有好的道德状态;个人是能够成为好公民的,即使他在道德上并不是一个好人。)它们甚至像恐怖分子那样绑架整个人民,以所谓危险、威胁或别的什么来向主权的实体也就是人民无耻地提条件、勒索,成为人民得罪不起的首恶,这在美国这样的大民主社会里都不能例外。国家在处理利益问题时常常目光短浅,在走向更大的共同体时,我们必须遵照埃利亚斯的教导,限制国家对待单个公民的无所不在的权力?“人权既不是具有‘先进’国民性的西方国家的公民基本权利标准,也不是国民性落后的民族国家政府愿意出让的一些公民权利,而是比民族国家更大、更高的共同体赋予每一个个人的更大、更有否决权的人类基本权利?”这种人权观念不

光能使康德所说的具有世界情怀的公民个人在民族国家内不受权利侵害,“还能使每一个个人更有远见地行动,更好地理解别的人类个人的富于远见的行动?”客观地对待自己的国民性,以更大的认同眼光来认识和捍卫每个个人的人权,乐观向上地对自己的文化和民族个性的发展抱远大的期望,这是康德以来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思想家一直在教导,也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里一再被忽略的:各种文化、各种更高的共同体,其目的必须是使每一个个人、每一个民族的天赋才能和已有造化发展到更高的层次,达到空前的无可替代的层次。处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各种国民性永不可能达到同样的层次或渐渐融合,但我们却可指望它们在更好的人类共同体里发展到自己的极致,不同,但同样完美(参见《判断力批判》,第83节)?

埃利亚斯是个仁厚的乐观主义者,他的人类故事里充满同情与期待,其过程(或历史)——社会学能安慰摸索着前行的人类面对波折和倒退时的痛苦。《个体的社会》可能是一本比《圣经》还用意恳切的书,因为后者只将人类血泪汗的真实历史当反面教材,压根不相信人类靠自己能走出自己的生物、人种、历史和形而上学局限性,自己为自己找到更广大的前景,而埃利亚斯却相信人类的这种自救可能,而且只相信这种自救。1989年,也就是去世前一年,看着当时的苏联还未有倒败的样子,埃利亚斯向人们正式道歉说是他的理论使人们抱了超级大国的对峙最终能在更大的认同中走向合作的希望,他深刻检讨自己的理论的“过分的预言性”。可这道歉未说完一年,人们从他的作品里推导出的预言就开始兑现。这可能是他临终前的一点安慰(参见《德国人》,译者前言)。1990年8月1日,埃利亚斯终老于阿姆斯特丹。

当代许多诱人的社会学作品都用心理学、生物学或其他学科的语言来表达,其他学科一有范式转换,其联系汇率就崩。埃利亚斯却用

简短的直陈式来表达,从不用社会学里的人工语言去封固其概念的语义域,读者用不着去推究他所用到的一些概念用意之深,尽可以用扎实的常识去意会他。他认为人类对自己过去的记忆链和未来的联系网络的认识,是随着其日常语言里所形成的越来越综合的语汇而提高,人们的更高的觉悟就反映在他们的语言的日常使用中。我们想提醒读者不要小看这种平白的表述,其中是夹着惊雷的。我们平生第一次译着译着竟按捺不住,做起了笔记和推论,译完后自己想去对付很多问题了。

今天在谈全球化的社会学家们好像都忘了埃利亚斯早从三十年代以来一直在我们耳边谈论这个问题。全球化社会学家罗伯逊费牛劲为人类未来设想的那个“元文化”假设,埃利亚斯早已那么轻松愉快地向我们阐明。布迪厄也应指出他日日用到的 *habitus* (个人社会习性) 这一核心概念取自埃利亚斯,等等。

埃氏屡得明师,早早出了开山之作,一生却从未有个合适的教职养家糊口。他曾揣着大学问到邻国一街道炉盖厂做供销员和经理,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流亡在一个岛国做访问讲师,退休好久倒讽刺性地成了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有过文革经历的我们应更能体认这种伟大智者在颠沛与被戏弄后的那种成熟。可贵的是,他从未感到自己被埋没,对人类的一切疯狂和不义一如既往地宽忍,总能把人类自作自受的痛苦往好里想,当成美好的教训积累,对人类的自我认识、自我成长总有那么多慈悲的期许。母亲死于纳粹毒气室,他竟七年不着文字,只怕影响自己对德、英、法三个民族的文明进程里的民族个性研究不客观。这本书里有诸多让我们读出热泪的地方。

献给我的朋友  
赫尔曼·考特和艾尔柯·考特

种子撒向风中  
知识任谁收获

## 前 言<sup>①</sup>

群体之于单个人即我们所谓的“个体”的关系,个人之于人类群体即我们所谓的“社会”的关系,这在目前绝非是明确的。可是,人们通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去关心它为什么不明确了。现有的像“个体”以及“社会”这些常见的概念,前者乃指涉单个的个人,仿佛这个个人是一个全然自为、独自存在的生物,而后者则通常摇摆于两种截然相反、但都是易造成误解的表象之间。在此意义上,社会要么被理解为众多个人的一种单纯集合,一种累加式的因而无结构的序列;要么被当做一个客体,这个客体以某种不能再明究的方式远在单个人的彼岸。在后一种情况下,那些预先向单个的言说者给定了的话语,那些决定并一同规定了在他们的概念领域里成长起来的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的概念本身,都使得作为个体来认定的单个人和被作为社会来表象的人类群体仿佛在本体上是各各不同的东西。

本书要探讨的是“个体”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在其当代形式下所

---

① 米歇尔·施略特的创意以及我们之间的合作,都使得这本书能以现在这种尝试性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此,我向他表示我的谢意。同样,我还要感谢我的助手鲁道夫·柯尼弗和让-威勒姆·哥利森,他们的诸多帮助对我是不可或缺的。



涉及的那些方面,即就人的某些方面展开讨论。它为思考和观察人提供了一些工具,其中有些是相当新颖的。谈论个体的社会,这一点本身就不同寻常。但这或许会帮助我们能够从对上述两个概念的陈旧的、较为习常的用法中解放出来。这种用法常常让这两个概念看上去简直是相互对立的一对,但[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把我们从前述意义上的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的定式中解放出来,即是眼前这部著作所要的工作之一。要真正完成这个工作,除非我们不是满足于某种否定的态度,即不是单纯批判那种把个体和社会当做互相对立的两个概念来对待的做法,而是除此以外还确立一种在方式和方法上全新的模式,从而使单个人无论怎样都是处于相互联系的群体中,亦即处于社会中。

进行这样的工作乃是社会学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点我大概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当时我正着手我的《文明的进程》的研究。《个体的社会》的最初纲要,那时实际上是作为上述著作第二卷里总括性的理论部分来构思的。我现在还保留着《文明的进程》的一些原始清样,其中的内容现在已收入本书第一部分。

在写作前一本书的过程中,个体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一再凸现出来。文明的进程已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世代交替。如果借助一些能够展现羞耻和难堪的限度值在某一方向上变化的有关证据,这个进程是可追溯出来的。这意味着,每一辈人的后代身处其中的都是文明进程的下一个时期。作为个体,他们在其成长过程中必须去适应比前辈人所适应的更靠后的衡量羞耻、难堪以及良知形成的整个社会过程的标准。所有社会性的自我规范模式,是单个人随着他经由教育而逐渐被教化成一个唯一的个体时必须独自形成的,因而它们都是为各代人所特有的,并且如此一来在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也是为各社会所特有的。这种对文明进程的研究,可以说曾让我很清楚地看到下面这一